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以四川省为例

肖钊富[a] 彭贤伟[a] 李瑞[a] 段霜[b] 安秀江[a1]

(贵州师范大学 a.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b.心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 2008—2019 年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总结了各市(州)的发展类型,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结果表明:(1)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攀枝花乡村振兴发展缓慢,成都、阿坝州、宜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心。(2)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呈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呈东南低、北部高的空间格局。(3)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等是影响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主要因子。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 耦合协调 驱动因子

【中图分类号】:F320;F590.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8141(2022)01-0061-08

乡村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受到自然、社会经济和人类活动的影响[1]。技术贫困、政策偏见和不适当的土地管理是造成乡村地区被遗弃的主要原因[2]。近年来,乡村发展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3,4,5]。

乡村振兴战略是现代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6],通过坚持农业和乡村优先发展,有助于弥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乡村短板。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旅游为目的,服务为手段,一、二、三产业相融合的新型生态产业[7],在解决乡村人才外流[8]、环境恶化[9]、发展迟缓[10]等问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表现为以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要素向乡村地区积聚扩散,从而促进旅游产业不断兴旺并最终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11]。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对该两大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1)研究内容上,多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旅游扶贫路径[12]、发展逻辑[13]、土地利用与乡村振兴的关系[14]、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关系[15]等方面。(2)研究方法上,有金融模型[16]、相关性分析[17]、变异系数[18]等方法,使用定量方法对耦合机制进行分析的研究偏少。(3)研究区域上,涵盖国家[19]、省[20]和区县[18,21]等不同尺度,且多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于西部代表省份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分析较少涉及,对该系统驱动机理的定量研究也仍显不足。

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有很强的关联带动作用[22],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四川省作

[1]**作者简介**:肖钊富(1997-),男,广东省茂名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与房地产。彭贤伟(1963-),男,贵州省遵义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与房地产评估。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2061028);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编号:2020043);贵州师范大学学术新苗基金项目(编号:黔师新苗[2021]A21)

为旅游大省和西部强省，乡村旅游已成为繁荣乡村经济、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村转型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选取四川省为研究区域，探究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特征及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分析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依据旅游发展现状总结融合发展模式，以期丰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研究体系，为其他地区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四川省位于 97° 21′ —108° 33′ E、26° 03′ —34° 19′ N，地处长江上游，国土总面积 48.6 万 km^2，下辖 18 个市和 3 个自治州（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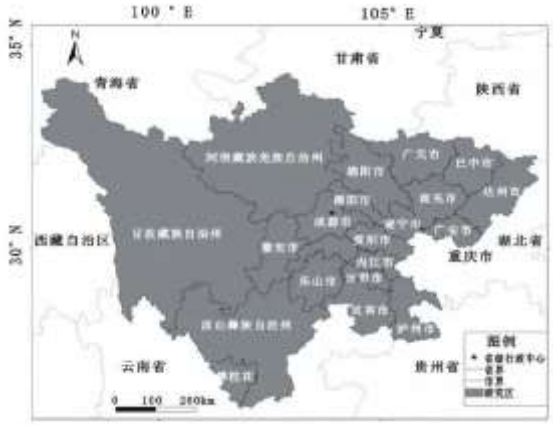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区区位

四川省是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高速的经济发展，成为我国山地旅游和乡村旅游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截至 2019 年底，四川省共有旅行社 1258 家，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11594.3 亿元，同比增长了 14.7%，居全国第四位。其中，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3.8 亿人次、乡村旅游总收入 2300 亿元。2019 年末，乡村人口和乡村从业人数为 3870.1 万人和 3173 万人，主要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为 4682.3 万 kW，实现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7889.3 亿元。四川省作为农家乐和民宿发源地[23]，乡村旅游发展最早，近年通过发展全域旅游，推动要素融合和产业辐射带动了乡村振兴，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演变对探究两者高质量具有代表性。

1.2 研究方法

熵权法：在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时，首先由客观原始数据确定各指标权重，步骤如下：

(1)标准化处理。

$$\text{正向指标：} x'_{ij} = \frac{x_{ij} - \min x_j}{\max x_j - \min x_j} \quad \cdots\cdots\cdots\cdots (1)$$

$$\text{负向指标：} x'_{ij} = \frac{\max x_j - x_{ij}}{\max x_j - \min x_j} \quad \cdots\cdots\cdots\cdots (2)$$

(2)计算权重。

$$y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cdots\cdots (3)$$

$$e_j = -\frac{1}{\ln n}\sum_{i=1}^{n} y_{ij} \ln y_{ij} \cdots\cdots (4)$$

$$\omega_j = \frac{1-e_j}{\sum_{j=1}^{p} g_j} \cdots\cdots (5)$$

式中，j=1,2，…，p;y_{ij}第 i 个地区第 j 指标的比重；e_j为 j 指标的信息熵；ω_j为该指标的权重。

多因素综合评价：结合指标标准化值和权重系数，分别求得四川省 21 个市（州）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指数。

$$CDI = \sum_{j=1}^{n}(w_j \times X'_{ij}) \cdots\cdots (6)$$

式中，CDI 为综合评价指数；w_j为各指标的权重；X'_{ij}为各指标单因子评价分值。

耦合协调模型：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来反映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程度。根据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得到乡村振兴系统和乡村旅游的综合评价值，分别记为 U、G，借助物理学中耦合协调模型，得到耦合度公式[24]：

$$C = 2\left[\frac{U \times G}{(U+G)^2}\right]^{\frac{1}{2}}, T = \theta \times U + \gamma \times G, D = \sqrt{C \times T} \cdots\cdots (7)$$

式中，C 为两系统的耦合度；D 为系统间耦合协调度；T 为乡村振兴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θ、γ 分别为两大系统权重，由于乡村振兴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同等重要[20]，取 θ=γ=0.5。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已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得到多领域应用，通过探测因子交互作用于因变量，从而揭示空间异质性的驱动机理，包括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25]。本文采用因子探测表征不同因子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异质性，表达式为：

$$q = 1 - \frac{1}{N\sigma^2}\sum_{i=1}^{L} N_i \sigma_i^2 \cdots\cdots (8)$$

式中，q∈[0,1];N 为研究区全部样本数；σ_i^2为指标的方差；i=1,2，…，L,i 表示分区，L 表示分区数目。q 值大小反映了空间分异程度，q 值越大，表示该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越大。

旅游相对优先度模型：为了真实度量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借鉴胡小海、黄震方[26]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引入旅游相对优先度模型：

$$P = G/U \quad \cdots\cdots\cdots\cdots\cdots\cdots\cdots\cdots\cdots\cdots\cdots\cdots \quad (9)$$

式中，P 为旅游相对优先度；U、G 分别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结合前人研究经验[26,27]，并征求专家意见，当 P>1 时，表示乡村旅游发展相对超前；当 0.5<P≤1 时，表示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同步；当 P≤0.5 时，表示乡村旅游发展滞后。

1.3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的文献资料[20,28]，依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6]，结合四川省实际情况，遵循指标构建的代表性、科学性、可比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可获取性原则，选取 2008 年、2013 年、2019 年 3 个五年规划中期年份为节点，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乡村振兴系统主要包括该 5 个子系统 14 个具体指标，乡村旅游系统指标包括发展水平、资源基础、支撑条件 3 个子系统 7 个具体指标，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值进行赋值。

2 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

2.1 子系统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分析

根据评价模型，得到四川省 2008—2019 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下 8 个子系统（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发展水平、资源基础、支撑条件）的发展水平概况（图 2）。由图 2 可知，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各子系统呈现出不同变化状态，表明 2008—2019 年间各类各子系统发展水平不一致。其中，资源基础方面呈快速增长趋势，这是由于随着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提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四川省响应号召，依据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景区和农家乐乡风文明、发展水平、生活富裕、生态宜居方面，呈总体稳步上升趋势，说明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人居环境质量逐渐改善、乡村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兴旺、治理有效、支撑条件方面 2019 年略微下降，主要原因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值和农业从业服务人员相应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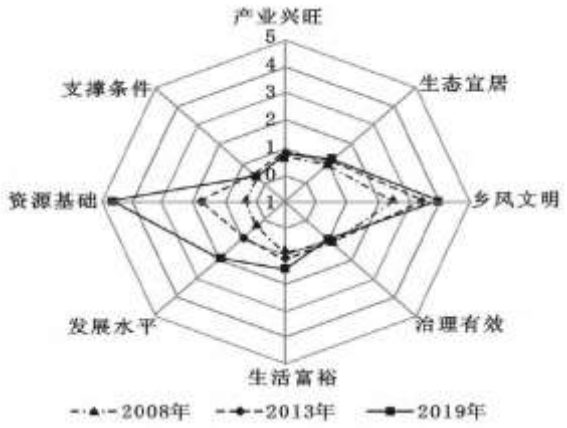

图 2 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子系统发展水平

2.2 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分析

本文运用公式（6）计算得到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 U、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 G，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23]与研究区实际情

况，参考标准分级后分析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图 3、图 4）。

由图 3 可知，2008 年、2013 年、2019 年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稳步上升，综合指数均值分别为 0.30、0.36、0.40。(1)从时间上看，2008 年全省乡村振兴普遍为低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成都（0.41），其次是甘孜州（0.35），皆为较高发展水平，其他各市（州）呈低或较低发展水平；2013 年凉山州、阿坝州、南充乡村振兴水平提升明显，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德阳、内江、攀枝花等 9 市无明显提升；2019 年全省各市（州）乡村振兴水平普遍提升，广元、绵阳、南充、宜宾 4 市处于较高发展水平。(2)空间上看，2008 年各市（州）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发展水平低值区位于四川中部和东部，2013—2019 年各市在布局上从散点状分布逐渐连接成片，最后形成“C”字型的乡村振兴水平高值区，位于川西南的攀枝花是乡村振兴发展落后的一块飞地。主要原因是：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城乡融合能带动乡村人口、土地和经济都有较高发展程度；位于川西山区的甘孜州、凉山州、阿坝州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随着政策支持与旅游业带动，乡村旅游资源和生态宜居价值得以开发，乡村旅游水平稳步上升；攀枝花作为工业城市，丰富的矿产等资源使得第二产业占比较大，乡村发展相对迟缓。

图 3 四川省乡村振兴系统时空格局演变

由图 4 可知，四川省 2008 年、2013 年、2019 年乡村旅游综合指数均值分别为 0.04、0.15、0.33，发展水平明显上升。(1)从时间上看，2008 年全省乡村旅游普遍为低发展水平，仅成都呈较低发展（0.195);2013 年成都、甘孜州等 6 市（州）发展得到提升，阿坝州发展明显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发展最好的仍是成都（0.46);2019 年各市（州）乡村旅游水平得到提升，宜宾、雅安和阿坝州呈较高发展，成都达到高发展水平（0.72）。(2)从空间上看，2008 年成都市乡村旅游一枝独秀，2013 年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2019 年形成由中部南北向的热线逐渐与甘孜州、雅安、绵阳等旅游发展较高地区连接成片的格局。原因是：2008 年受南方冰灾与汶川大地震的影响，全省乡村旅游水平低，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乡村振兴受到足够重视，四川省得到响应，使各市（州）乡村旅游资源得到发展。2013 年，四川省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的意见》等政策，促进各市（州）多点多极发展，阿坝州全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 390 万人次，发展最为迅速。2018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个部门联合印发《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 年—2020 年）》，乡村旅游助推区域发展在四川省得到持续推进。

图 4 四川省乡村旅游系统时空格局演变

3 耦合协调发展演变特征

本文根据耦合协调模型，选取四川省 21 个市（州）2008 年、2013 年和 2019 年 3 年截面数据，根据公式 7，得到 2008—2019 年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图 5）。其 D 值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27,29,30]划分为以下等级[24]。

总体上，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呈同步上升的趋势，2008 年、2013 年、2019 年耦合协调度 D 值均值分别为 0.32、0.47、0.58，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耦合协调度 D 值介于 0.20—0.80，平均值不超过 0.50，说明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互相抗衡特征较为明显，未实现理想状态下的耦合[20]。按照等级分析，其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等 7 个阶段，协调类型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尚未达到优质协调。从时间上看，2008 年仅成都（0.53）达到勉强协调，其他各市（州）D 值介于 0.20—0.50，说明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普遍失调；2013 年全省 21 个市（州）中，除德阳、内江、自贡、攀枝花属于轻度失调，其他 17 个市（州）的协调性不断提高并达到勉强协调及以上，成都（0.68）、阿坝州（0.68）、甘孜州（0.57)3 个市（州）的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达到初级协调水平；2019 年各市的耦合协调度发展除资阳有停滞现象外，其他各市（州）呈上升趋势，其中成都（0.80）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德阳、攀枝花等 5 市耦合协调度呈濒临失调水平。原因主要是：成都在经济发展和乡村资源开发利用更有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旅游与环境发展的不足，更易达到耦合协调；阿坝州拥有高密度、高品位的生态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且在汶川大地震后，成为全国开展防震减灾研究和科普教育、缅怀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目的地；凉山州协调耦合度呈先增加再减少的变化，在于川西地区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是自然灾害频发、经济较不发达，交通等基础设施运行情况波动较大。

图 5 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时空格局演变

4 协调发展驱动因子与类型策略

4.1 驱动因子选取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18,31]，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万人拥有乡镇文化站等 10 项指标作为探测因素。其中，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衡量经济驱动力，采用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3A 级以上景区数、每万人拥有乡镇文化站 4 个指标衡量资源吸引力，借助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乡村就业人员、公路旅客周转量、乡村年接待人次 4 个指标衡量服务保障力，依托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衡量产业驱动力。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的因子探测，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探究。基于耦合协调度 D 值，在

ArcGIS 中将研究区分为 5km×5km 格网后提取各因子平均值，对 10 项指标进行等间隔离散化处理。最后得到不同因素对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的分异度 q 值，且影响力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

4.2 驱动因子特征分析

该 10 项指标在 3 个年份中都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有较强影响，且 q 均值大于 0.5，各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时间异质性。每万人拥有乡镇文化站和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对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呈上升趋势。各因子对协调度的影响力在不同年份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2008 年耦合协调度主要受到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q=0.8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q=0.63）等因素影响；2013 年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q=0.8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q=0.75）、3A 级以上景区（q=0.65）等情况在耦合协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 年更多的是受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q=0.86）、乡村年接待人次（q=0.72）、每万人拥有乡镇文化站（q=0.72）等因子影响。整体而言，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是各影响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概括如下：(1)经济驱动力。3 个年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力先减少后增加，q 均值为 0.61,2013 年 q 值为 0.34,2019 年 q 值增加到 0.86，增幅为 153%，表明经济驱动力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驱动作用越来越强。乡村旅游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资金投入加大，使得乡村地区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得以改善，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2)资源吸引力。资源吸引力中的 4 个指标的 q 值均值范围为 0.53-0.69，表明资源吸引力对四川省乡村融合发展有较强驱动作用。其中，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该指标 q 均值 0.69，是所有均值中的最高值，说明农家乐和乡村酒店的建设发展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农家乐、精品酒店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能促进农民就业、增加税收[32]。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3A 级以上景区指标的影响力先减少后增加，总体趋于稳定，说明旅游资源基础始终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有一定影响力。(3)服务保障力。服务保障力中的 4 个指标 q 值均值范围为 0.50-0.59，表明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乡村就业人员、公路旅客周转量、乡村年接待人次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有一定驱动作用。其中，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不断增加，说明人才培养特别是旅游人才建设能促进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乡村旅游业依赖公路交通，良好的交通基础能够改变游客目的地选择和目的地结构[33]。(4)产业驱动力。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的 q 值先增加后减少，均值为 0.59，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多产业、多部门的要素聚集能带动农户生计转型，增强乡村经济的稳定性。

具体来说，旅游经济开发与乡村投资加大作用于经济驱动力，利于提升投资与旅游开发；乡村文化传承与旅游服务建设作用于资源吸引力，利于发展文化与乡村旅游；设施完善与治理结构优化作用于服务保障力，利于优化服务治理体系；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就业带动作用于产业驱动力，利于带动产业结构转型。4 种机制相互作用、交互耦合，共同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发展（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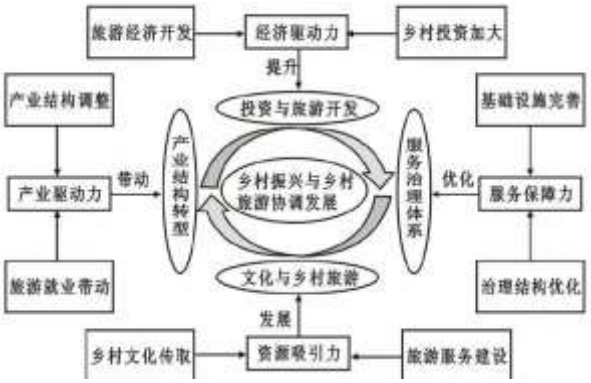

图 6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4.3 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及策略

为实现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需要厘清各市（州）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参考前人研究经验[27]，选取本文截止年份（即 2019 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根据公式（7）、（9）测量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和旅游优先度，依据分级标准将 21 个各市（州）发展耦合类型进行分类。可见，2019 年两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总体良好，为勉强协调，说明四川省已逐步将乡村旅游优势融入乡村振兴。

根据测量结果，将耦合协调度>0.5 划为协调性显著城市，≤0.5 划为协调性不显著城市[27]。结合旅游优先度，将 21 个市（州）划分为 5 种类型，并在归纳旅游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立足全省发展现状和需要，尝试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模式。考虑到新冠疫情中乡村旅游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34]，因此本文总结的发展模式及策略对后疫情时代的乡村旅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综合评价法对 2008—2019 年四川省 21 个市（州）两大系统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分析耦合协调水平和演化特征，探究了二者空间分布规律，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对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进行了探测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四川省乡村振兴水平呈上升趋势，在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方面稳步增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方面略有下降。2008 年除成都（0.41）和甘孜州（0.35）为较高发展水平，其他各市（州）水平较低；2013—2019 年全省乡村振兴达到较高发展水平，攀枝花发展最为缓慢。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高值区从散点状分布逐渐连成片，最终呈“C”型布局。(2)四川省乡村旅游水平稳步上升，在资源基础方面增长最为突出，发展水平方面稳步上升，在支撑条件方面缓慢下降。2008 年，成都乡村旅游一枝独秀，2013—2019 年全省大部分地区乡村旅游水平得到提升，成都、阿坝州、雅安、宜宾是全省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心，形成由中部南北向的热线，逐渐与甘孜州、绵阳等市连接成片。(3)四川省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存在交互耦合关系，耦合协调度 D 值介于 0.20—0.80，整体上呈增长态势，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经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 7 个阶段，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2019 年阿坝州（0.74）达到中级协调，成都市（0.80）达到良好协调。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4)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按影响力大小排序为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教育支出占比、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等，不同年份中各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同。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是各驱动因子作用并形成旅游开发与投资提升、文化传承与旅游资源发展、服务保障与治理优化、结构转型与产业带动四元驱动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地区应根据乡村旅游发展特点，合理规划，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建议：(1)以政策为导向，增加资金投入，强化乡村振兴的要素支撑，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合理配置和利用土地，加强公共交通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投资参与乡村旅游经营，促进乡村绿色发展。(2)以机构建设为支撑，充分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协同合作，加强产业和人员融合，重视高素质乡村服务人员培养，打造绿色可持续的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乡村资源。(3)以川西山区为着力点，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把握国家政策机遇，促进扶贫开发，提升区域经济社会水平。

参考文献：

[1]Meng L,Huang J,Dong J.Assessment of Rural Ecosystem Health and Type Classific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8,615：1218-1228.

[2]Liu Y,Li Y.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Nature News,2017,548(7667）：275.

[3]Eufemia L,Bonatti M,Lana M A.Colombia′s Rural Development Must Honour Peace Agreement[J].Nature,2018,

560(7716）：29-30.

[4]Mitchell S,Gelman A,Ross R,et al.The Millennium Villages Project:A Retrospective,Observational,Endline Evaluation[J].The Lancet Global Health,2018,6(5）：e500-e513.

[5]Zhang G,Zheng D,Wu H,et al.Assessing the Role of High-speed Rail in Shap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A Case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China[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20,704：135399.

[6]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4）：637-650.

[7]郭焕成，韩非.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8]刘彦随，龙花楼.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进展及展望：建所70周年农业与乡村地理研究回顾与前瞻[J].地理科学进展，2011,30(4）：409-416.

[9]王永生，刘彦随.中国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现状及重构策略[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5）：710-717.

[10]杨忍，刘彦随，刘玉.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动态与区域差异格局[J].地理科学进展，2011,30(10）：1247-1254.

[11]何成军，李晓琴，曾诚.乡村振兴战略下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机制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2）：101-109.

[12]王超，罗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36(1）：8-18.

[13]宋慧娟，陈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路径探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8,(6）：76-81.

[14]Wang P,Qi M,Liang Y,et al.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Land Us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Using a Coupling Analysis:A Case Study of Hainan Province,China[J].Sustainability,2019,11(22）：6266-6284.

[15]Zhou Z,Yang Q,Kim D J.An Empirical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J].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Technology,Market,and Complexity,2020,6(3）：65-80.

[16]Radovic G,Petrovic M D,Demirovic Bajrami D,et al.Can Proper Funding Enhance Sustainable Tourism in Rural Settings?Evidence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J].Sustainability,2020,12(18）：7797-7812.

[17]黄葵.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及其与乡村振兴关系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4）：216-224.

[18]刘智.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张家界为例[J].经济地理，2020,40(2）：209-216.

[19]徐维祥，李露，周建平，等.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9）：2044-2062.

[20]董文静，王昌森，张震.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J].地理科学，2020,40(4）：628-636.

[21]赵玉婵，陆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36(10）：1133-1139.

[22]陆林，任以胜，朱道才，等.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9,38(1）：102-118.

[23]Gan L,Shi H,Hu Y,et al.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for Urbanization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Level:Sichuan Case[J].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20,58：102136.

[24]廖佶慧，彭贤伟，王权，等.海峡西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其耦合协调关系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21,30(3）：556-566.

[25]王劲峰，徐成东.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地理学报，2017,72(1）：116-134.

[26]胡小海，黄震方.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特征及其作用机制[J].江苏社会科学，2017,(1）：254-259.

[27]孙剑锋，李世泰，纪晓萌，等.山东省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评价与优化[J].经济地理，2019,39(8）：207-215.

[28]沈剑波，王应宽，朱明，等.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J].农业工程学报，2020,36(3）：236-243.

[29]丛小丽，黄悦，刘继生.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研究[J].地理科学，2019,39(3）：496-505.

[30]王兆峰，霍菲菲，徐赛.湘鄂渝黔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J].经济地理，2018,38(8）：204-213.

[31]殷杰，杨艺同.我国展览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子[J].经济地理，2020,40(8）：194-202.

[32]侯兵，陶然，毛卫东.文化生态视野下的精品酒店主题文化定位与价值取向[J].旅游学刊，2016,31(11）：42-54.

[33]郭向阳，穆学青，明庆忠，等.旅游地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的空间耦合分析[J].地理研究，2019,38(5）：1119-1135.

[34]马波，王嘉青.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旅游产业新走向[J].旅游学刊，2021,36(2）：1-3.

[35]麻学锋，刘玉林，谭佳欣.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为例[J].地理科学，2020,40(12）：2019-2026.

[36]王永生，文琦，刘彦随.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J].地理科学，2020,40(11）：1840-1847.